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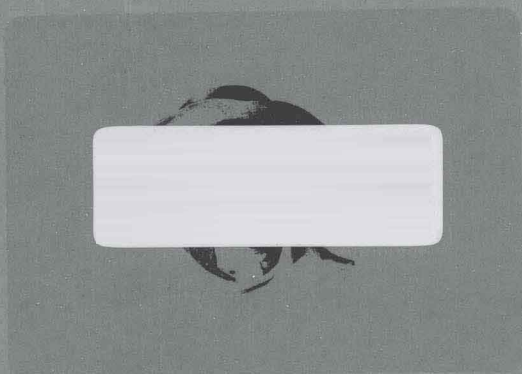
主编
陈众议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歌德学术史研究

Die Er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über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叶隽 著



 译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歌德学术史研究

Die Er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über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叶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学术史研究 / 叶隽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8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2638-2

I. ①歌… II. ①叶… III. ①歌德, J.
W. G. (1749 ~ 1832) - 人物研究 ②歌德, J.
W. G. (1749 ~ 1832) - 文学研究 IV. ①
K835.165.6 ②I516.064



书 名 歌德学术史研究
作 者 叶 隽
责任编辑 彭 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297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638-2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殆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实在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序言

叶隽让我为他的新著写几句话,我是乐意的。这倒不是因为我对歌德有多少了解,或者对学术史研究有什么新见,主要是出于对他在新著中所显示出来的识见与理念的认同,并以示对新著出版的祝贺。

中国有学术史研究的传统。到了近代,梁启超、王国维、钱穆等诸多学人都对中国的学术史研究做出过贡献。20世纪中叶,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沉寂。80年代开始有所回升,有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等著作面世。学术史研究的热潮出现在90年代以后,各学科的专家在近20年里相继推出了一批研究著作。就文学领域而言,就有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杜书瀛等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李春青等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和方勇的《庄子学史》等数十种。叶隽在学术史研究方面成果也颇为丰硕,他的多部关于留德学人的专著受到学界关注。学术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固然有学者倡导与应和的因素,但更有其必然性。世纪之交,中国学界面对深刻变动着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无法回避如何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推动学术发展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史研究的价值自然被凸现了出来。

做学术史研究要对某个学术领域做直面历史的科学梳理,要记录下众多学者以生命和智慧构建的知识系统和范式体系,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重要的学术问题,要有理性的反思精神,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更需要研究者具备较高的学术境界与创造力。叶隽研究的是歌德学术史,这更是对他的学识、境界和创造力的一次非同一般的考验。如他所言:“在德国文学史

上,‘歌德学’是显学,是学科史上几乎逃不过去的;在世界文学的学术史上,‘歌德学’更属于巍巍乎高哉的显学。”可喜的是,叶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我看来,这本新著中提出的治学术史的理念同样可贵。

这些理念中有对前人已有陈述的阐发。例如,何谓学术史?“所谓学术史,其思路不外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在学术传统的脉络中把握历史,确立坐标,有所依循,逐次渐进”;学术史功用何在?“没有基本的学术史意识,想做出一定的学术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想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那样“‘循序渐进’、‘有所依凭’,乃至‘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经由学术史的梳理之功则为不二法门”,等等。这些理念中更有不少作者独到的思考。例如,关于治学术史的方法和途径:“以学者个案研究为基础,以学术史清理为目的;以时间为序、问题为线,突出大家、呈现论争,复原语境、带动思潮。在注重专题史、学科史、学术史维度扩散的前提下,力图做到以小见大”;最具挑战性的是“考镜大师”,因为这些前贤的治学经验构建起了学术史研究的主脉,“考镜大师”有难度,更有启迪。诸如此类的见解都是长期浸润其中的学者的可贵心得,而以下几点格外值得重视。

一是关于学术史研究的思想史视阈问题。在叶隽看来,学术史研究不能止于本专业乃至本学科的层面。学者“应当具备学术史的宏观意识,也就是说,要有以知识域拓展为前提的基本常识”;学术史“是一种相当特殊化的学术视域里的专门性考察,但它毕竟仍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而关起门做学问,故此还是应当自觉汲取接受理论的资源给养,以期窥斑见豹”;引入思想史的维度十分必要,“因为只有将思想史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学术资源’纳入视野,学术史的研究才会获得一种普遍意义的质感的赋予”。作者在这本学术史著作中就特别注意“彰显思想史维度”,“借助思想史维度打通学术史研究的‘奇经八脉’”。学术史研究不仅仅要将以往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有追求的学术史研究者必然会将某个知识系统的整体发展与演变的轨迹纳入自己的视野,会引入思想史等有价值的学术资源,从而超越简

单的梳理概括的格局而构筑起自己的学术逻辑。

二是学术史研究的世界眼光与本土问题。叶隽的思考与他在这本著作中从事的“德国日耳曼文学学科史中的一种重要的专题史研究”有关。在他看来,这一研究要求世界眼光,研究对象虽然只是歌德学学者,但同时要求对歌德研究的学术制度、文化背景乃至时代语境等有较为深刻的认知,也要深入理解作为歌德学学者研究对象的歌德,“如此才可能以一种较为融通的眼光去审视学术文本、学人思想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要求中国学者应该借助于“通论学术”的中国传统和现代理论资源,“呈现自家的‘异者意识’,即始终强调一种‘中国他者的观照意义’”。叶隽的这一思考虽有特定的语境,但是仍值得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重视,没有这样的意识,恐怕难有佳作。这本著作将梳理德国“歌德学”学术史纲领为背景,重点“探讨歌德学迁变过程中的若干重大‘研究范式变形’之意义”,体现了作者的理念;著作的结论部分谈到了中国的歌德学学术史,将相关的学人置于“世界学术、德国学术”、“中国主流学术”的视野中加以阐述,也体现了作者的理念。

三是中国学术的“国际对话空间”问题。叶隽在谈及他的研究时指出:“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我想无非是以下三条:其一,他人未及为之之事,我为之;其二,能呈现‘有我之作’;其三,带来学者自身的本土文化资源,并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异质文化的学术碰撞带来致思的可能。”他认为,在明确“德国学”的整合性概念,明确跨学科聚焦对象的探索意识和形成学科建构的自觉意识时,可有以下基本向度:1、确立“德国学”建设的基本学科取向,在“外国学”整体建构的思维中来明确“德国学”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在“德国学”的增量语境范围中确立“歌德学”的定位和意义。2、明确“歌德学”作为公共学域的意义。3、追寻“东方现代性”的原则性主体定位,确立中国学术的“国际对话空间”。叶隽的上述见解凸显了中国学者应该强化的主体意识、对话意识和跨学科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强调的是中国学者的主体

性,“这种主体性一方面表现在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即脱离不开中国现代学统认同与改革三十年来的问题情境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应该表现在我们在方法论上有自觉的传统资源借鉴和建构努力方面”。所谓“对话意识”,强调的是互动的重要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现代性命题的共显,为世界各国的学者共同提升某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机遇,“中国学者应当在一种整体背景中去确立自己的基本定位”。在与各国学者的互动中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与坐标意义。所谓“跨学科意识”,强调的是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自觉“扩充自己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域”,主动“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乃至积极对话的尝试”。

叶隽的这些见解着力点不同,但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某些理念也许暂时还处于“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境地,但对于中国的学术史研究有着启迪的价值。《歌德学术史研究》是叶隽实践这些理念的尝试。他自言:“是否成功,不必期待。重要则在于,在这样一种艰难的过程中,自己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有所收获。”纵览全书,可以说作者基本达到了自设的目标:从歌德学研究入手,关注德国学术内部的学术史脉络,包括学科史沿革和德国学术史;借助中国传统里“通论学术”的特点,返观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学术。

作为奋发有为的青年才俊,叶隽已经在他的著述中显示了向“大气的学者”稳步前行的禀赋。我愿借此机会祝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建华

2013年春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歌德学在德国语境之形成及其学术 机构化历程:兼及“歌德学”的世界 扩张
5.....	第二节 接受史与学术史之区分——学术史 研究的思想史视阈拓展
9.....	第三节 基本思路和研究预期:“歌德学”之 研究的世界眼光与本土问题
13.....	第二章 “歌德学”的预备阶段:同代人的批评 与 19 世纪中期的接受史
13.....	第一节 古典同仁的歌德阐释:以席勒为例
29.....	第二节 浪漫思脉的歌德批评:以施莱格尔 为中心
43.....	第三节 启蒙思脉的歌德阐释:以黑格尔为 中心
59.....	第三章 19 世纪后期“歌德学”的建立
59.....	第一节 歌德学概念的溯源及其学术建制内 生成
78.....	第二节 自然科学范式与实证主义研究—— 谢勒尔《歌德学》的学术史意义
99.....	第三节 精神科学视阈中的文学史研究—— 论狄尔泰《歌德与文学创作的想象》
113.....	第四章 20 世纪上半期的歌德学
113.....	第一节 威廉帝国后期的歌德学:赫克尔、西 美尔、宫多尔夫的三分路径
129.....	第二节 魏玛共和时代的歌德学:李凯尔特

	的文化科学导向、科尔夫的精神史
	研究与本雅明的批评家立场
145.....	第三节 第三帝国时代的歌德学——彼得逊 的亲纳粹立场、埃姆里希的心灵流 亡与卡西尔的综合性阐释
161.....	第五章 1945—2005:战后六十年的歌德学
161.....	第一节 未分裂的德国及其歌德阐释
176.....	第二节 东西合集时代的歌德学路径:社会 史研究、意识形态批判与接受美学
197.....	第三节 共和国的精神象征:1990年后统一 德国的歌德学
210.....	第六章 歌德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210.....	第一节 研究范式的迁变:主流、继承与求新
224.....	第二节 社会语境的制约:民族、时代与文化
241.....	第三节 主体生性与学者素养:学养、见地与 通感
253.....	第七章 结语
253.....	第一节 学术史视野中的“专题史脉络”:通 论学术如何可能?
266.....	第二节 传统的确立与后人的方向——中国 歌德学学术史的梳理
281.....	第三节 社会科学理论的辨析:东方他者与 中国学术的“国际对话空间”
295	后记
298	附录一 重要文献